

■ 访 谈

以温柔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

——关于小说《人工少女》的对谈

□ 龚万辉 罗建森

“我想写一个在废墟里寻找意义的故事”

罗建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您的个人成长经历,比如小时候的生长环境,以及在吉隆坡和中国台湾的学习经历,对您后来投身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龚万辉:虽然出生在马来西亚,但我从小就在华文语境里成长。我母亲是散文作家,但真正影响我的是中学一起写作的同学。当时学校里有个写作的社团叫“创研社”,社内的同学和老师,会让社员读一些现代文学,也尝试写诗和小说。我很幸运,很早就感受到创作的乐趣。中学毕业后,离开家乡小镇,一个人到大城市,生活中有很多需要去适应的,却也感受到城市的便利和信息的潮流。我常常整个下午待在书店里看完一整本书,当然是为了省下买书钱。20世纪90年代末,村上春树的小说很红,我对其中超现实的情节特别着迷。也读了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的译本,走进了魔幻写实的世界。此外,骆以军、袁哲生、邱妙津等作家都在那时出版了他们的第一、二本书。他们的作品都影响了我对小说的观念,不论小说技巧或创作形式,为我打开了一扇扇不同的窗。

对了,那段时间,文学和艺术创作都流行起了“后现代”。为了搞懂这个名词,囫圇吞枣读了一些翻译拗口的评论书,但最后好像也没真正搞懂。

罗建森:《人工少女》讲述了一个未来世界的父亲,带着人工女儿在城市废墟中穿行并不断回忆往事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和创作契机是什么?

龚万辉:有一天我在读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读到 he 评论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她凝视着前方,她的嘴微张,她的翅膀张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她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她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她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她背对着的未来,而她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我觉得本雅明所描述的“新天使”,其实非常科幻——她是超然于人类的。她一个人站在文明的废墟之上,想修补这个世界,面对越堆越高的废墟却徒劳无功。

这个天使的形象,就是我想写一个“人工少女”的契机。在这之前,我原本就正在构思一个灾难之后的废墟世界。我想写一个在废墟里寻找意义的故事。而动笔写“第一个房间”的时候,人造人的概念——莉莉卡将以人工方法制造出来的想法已经成形。莉莉卡将是超然于人的存在。她就是我们时代的“新天使”。她或许没有寿命的限制,而终究看得到时间的业力。

走进不同的“房间”

罗建森:很多读者估计会将《人工少女》划入科幻文学的范畴,但读来就会发现,小说舞台虽然设置在未来,但它并不属于未来,而是被“困”

在过去。时间不断流逝,记忆却在不断回溯。您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反差的叙事方式,想要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时间观?

龚万辉:我想《人工少女》并不能算严谨的科幻小说,我只是借用科幻小说常见的元素来写这部小说,反而得到一种任意虚构的自由。

《人工少女》对时间的表现和理解有一个设置,那就是“空间就是时间”。空间会留下我们居住过的痕迹,每一个房间都充满了时间的故事。若我们待得够久,空间甚至会变成我们内心的模样,反之亦然。也就是小说中提及的,我们所在的空间就是我们的“容器”。

相对的,时间也可以是另一种空间,时间就是房间。小说的角色常常困在某个时间点里走不出来。所以故事中对过往时间的追溯,常常就是走进不同的房间之中。

罗建森:小说中的莉莉卡,既是“我”的人工女儿,是“我”唯一的陪伴者和倾听者,也是世界最后的希望所在。莉莉卡有什么人物原型吗?您在小说中多次提到绫波丽,绫波丽是您理想中莉莉卡的样子吗?

龚万辉:我在小说中提到绫波丽,是希望读者有一个参照,可以想象人工少女莉莉卡的样子。莉莉卡和绫波丽当然有很多契合的地方,她们都是人造出来的女儿,没有自己的成长记忆,所有情感都是后天学习的。

我想,莉莉卡首先必须是一个少女。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甚至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留下的雕像来看,艺术家经常以少女作为创作的主题,以至于当我们想象神话中的女神时,脑海中也都是少女永恒无暇的形象。当然,日本文化中有无处不在的对少女的各种遐想和凝视。最经典的情节呈现在川端康成的小说《睡美人》里。

罗建森:小说中设置了十二个房间,各有其主要角色和情节,且互相紧密关联。您在构建这些房间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考量?

龚万辉:《人工少女》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此之前,我只写短篇小说。《人工少女》中十二个房间的设置,其实是非常接近短篇小说的写法的。

在原本的构想里,《人工少女》可能比较接近公路电影,父女二人一直在路上追寻答案和救赎。但一面写,一面调整,到后来才确认时间的回溯必然不会是线性的。回忆和未来、梦境和现实,可能是同时发生的。小说的时间似乎以一种前进一步,倒退两步的方式运行。它不再指向一定的方向。那十二个房间组成的钟面,指针是可以任意指向其中一个房间的。相连的人物和情节,把不同房间串接起来。当然,这样的表现形式也带来了故事的破碎和不完整。但我反而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去写这本小说,因为在时间废墟里留下来的东西,原本就应该是零碎不堪的,等待我们慢慢拼凑起来。

马华文学是流动的

罗建森:提起马华文学,我们通常都会想到“雨林”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意象。《人工少女》的雨林生长在城市的裂隙之中,城市破落衰败,植物和动物却重获生机,作为新的生命在地球上延续。对您而言,这种对自然的书写意味着什么?

龚万辉:我有时也会忧伤地想,我辈作家必

龚万辉,1976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曾获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奖等。著有小说集《卵生年代》《隔壁的房间》,散文集《清晨校车》,图文集《如光如影》《比寂寞更轻》。长篇小说《人工少女》入选2022《亚洲周刊》世界华人十大小说,并获第17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

然再也写不出像张贵兴那样生猛、情节繁复的雨林小说了。那不是我可以掌握的题材。然而我还是在小说中加入了雨林景观的部分,可以说是对前辈的一种回应。

雨林在城市发展中渐渐消失,当雨林不再是生活场景时,我们对雨林反而可以有更多想象。在我的小说里,雨林接近虚构,它变成了城市中心的监狱墙上的一幅巨大、绵长的壁画(这倒是真的)。我相信“雨林”在马华文学中不会真正消失,或许它会转化成不同的样子,容纳更多大胆的梦想。可能到最后,雨林会不会脱离了写实和历史,而变成马华文学的想象的共同体?

罗建森:黎紫书在序言中写道:“龚万辉的写作,与中国读者一般知道的马华作家是如此不同。他代表的是马华文学的另一个向度。”您怎么看这一评价?

龚万辉:或许很多读者对马华文学仍带有刻板印象,但我觉得,马华文学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流动的词。

因时代变迁,早期马华作家重置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连带改变了创作主题和关怀方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它从写实主义向现代主义演化;而在90年代至今的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下,作家从历史叙事和南洋书写,转向个人本位的内向书写……

所以我觉得,我并不能真正代表马华文学的另一个向度。我只是书写个人经验,只是看起来在题材选择和表达方式上有些和前辈们不一样。我们可以从同时期各个马华作家的作品中,看见马华文学的各种关注、不同的面貌和表现形式。或许读者会发现,马华文学好像渐渐无法用单一的方向、题材或形式去描述,正因如此,马华文学还是值得期待的。

罗建森:同样是黎紫书谈到的,“他总是在书写中用水彩的笔触削弱死亡的终极性,不把它处理成人生的终结,而让它成为这世间另一种形态的诞生……那些‘据闻’已经死去的人,终会在街头巷尾再次出现”。为什么选择用偏向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处理书中人的命运?

龚万辉:《人工少女》里的各种伤害、死亡和末日,后来都不是最终的毁灭,而是转化成另一种样子。所以婴孩化为野猪崽子、手上的伤痕化为蝶,一座城市被人类遗弃后反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现实当然常常是残酷的,所以写小说的时候,在面对死亡这样绝对、巨大而沉重的主题,能不能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和表达它?或许这就是创作者源自内心的一种“不忍”。

我很看重小说中被允许的虚构。甚至我觉得,虚构就是小说创作的一个目的。我在小说里采用了许多魔幻的情节,其实就是为了提醒读者看见虚构的部分。我觉得小说必然要创造出和



《人工少女》,【马来西亚】龚万辉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7月

现实不一样的时空,这个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感,就产生了小说的魔力——现实是可以被重组的,现实是可以允许我们从退一步的距离去面对的。所以,每当小说进入魔幻、超现实的部分,才让原本的孤独、伤害和死亡,变得可以被注目和被理解。

文学让我们看见彼此

罗建森:在中国,有研究者把您和黄锦树、黎紫书、张贵兴等马华作家一起纳入“新南方写作”的研究范畴。您怎么看待“新南方”之“新”?

龚万辉:“新”当然是一个相对的词,它有没有与之相对的“旧”?或许因为念过美术系,接触了漫长的艺术史,从文艺复兴而至印象派,现代艺术各个流派的主张、新思潮的诞生,常常让我觉得,新旧旧并不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而是在原有的创作体系之中,提出开创性的、新的思考方向。所以,“新南方”的“新”,仍应该立足于南方的特色,以不同视角去看待我们共同身处的时代。

罗建森:您之前参加了“中国文学新浪潮”海外推广系列活动,其间还和中国作家龚万莹成功“认亲”,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和在中国作家的交流过程中,您对中国马两国文学创作的异同产生了哪些新的看法?

龚万辉:我和万莹的相遇,其实并不是因为远亲关系,而是因为我们在不同时间接触到了彼此的文字,而对这个跟自己名字相像的作者产生了无比的好奇。万莹说,恰好我们的名字里都有光。我觉得她说得真好,是文学的光让我们远远

地看见彼此吧。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希望看到不同地方的华文文学,仍保留着彼此的异同。虽然都用华文创作,但语言上的杂质,那些没有被规范用字,正是这个“有点儿不一样”的部分,才让我们看见彼此。我这趟中国之旅,走了一遍福州、泉州和厦门,也能稍稍感受到南方城市那种不同文化的混杂和相融。这可能和马华的多元也很像,我们甚至有相通的方言,但实质上又可以清楚看见彼此在创作上不同的特点。

罗建森:在您看来,今天的马华文学发展的可能性有哪些?

龚万辉:马华文学的场域很小,本地读者也很少,它甚至不属于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一部分,但相对的,它似乎也拥有了一种不被关注的自由,有点野生野长的感觉。我相信,只要新一代马华作家还在写,它就一定还有发展空间。一直写下去,努力被看见。而选择以华文写作,就不要画地自限,不要拘于马华本土,而要相信自己的作品是可以连接整个华文世界的。

罗建森:接下来您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会比较关注哪些题材?

龚万辉:我在创作《人工少女》时,挖掘出了老家和小镇上的一些故事。《人工少女》里写了一部分,但它似乎还可以延伸出更多枝节,值得写一写。我正以此构思下一部长篇小说,但现在一切都还没有成形,只希望下一本作品的表现方式有别于《人工少女》。

罗建森:最后想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您真的身处《新世纪福音战士》所描绘的世界,会选择发动“人类补完计划”吗?您觉得“心之壁”是否需要被打破?

龚万辉:我觉得此时此刻,所谓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将所有人的生活、思绪上传到看不见的云端,集中在巨大的数据培养槽里头,不就是《新世纪福音战士》里“人类补完计划”的某种类同的呈现吗?

我在90年代网络初兴的时候,曾经相信网络是乌托邦那样的存在。如今在大数据时代,在人工智能时刻企图模仿人类创作的年代里,我反而格外珍惜个人的存在和个人记忆,那是唯一不能被取代的吧。所以,我不再相信“人类补完计划”,但我仍然相信人与人可以努力地相互理解。我们可以保有自己的“心之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拥有一颗同理之心,用温柔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

■ 书 讯

方丽娜长篇小说《到中国去》出版



旅奥华文作家方丽娜创作的长篇小说《到中国去》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该小说以抗战时期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傅莱为原型,以国际友人的视角重现1939年至1949年的峥嵘岁月。

奥地利医生罗生特1939年流亡到上海,1941年成为第一个参加新四军的国际友人,1942年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在抗战期间救助了大量伤员。同为医生的傅莱也是1939年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1945年初,他成功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批粗制青霉素并投用,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傅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籍,余生都在中国度过。

小说基于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位奥地利医生为逃离纳粹迫害,在时任中国外交官何凤山的帮助下从维也纳来到上海,继而奔赴各地投身抗战的故事。他们在盐城救治新四军伤员,在延安建立卫生学校、研制青霉素,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被称为“奥地利的白求恩”。

作者方丽娜说,十多年前偶然听到了两位奥地利医生的故事,他们都是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

战士,后来就有意识地搜集他们的相关资料。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以他们为代表的国际友人的事迹让人感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身影可能在历史的长河里渐渐被遗忘。“八十年前他们奔赴中国战场,与中华民族生死相依,并肩战斗,但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我一定要把他们故事写出来。”

在作家、学者梁鸿看来,这部小说是从1939年何凤山为两位主人公发放中国签证那一刻真正开始的。“两位奥地利医生为什么来到中国?这一切始于何凤山对人类命运普遍的人道主义关怀。中国人的内心是非常辽阔的,正是中国人这份朴素而深情的人道主义精神促成了这样一场国际主义的漫游。在小说的许多细节里,我们都能看到中华民族所展现出的博大胸襟和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梁鸿认为,在二战期间,“到中国去”不单单是一句口号,背后有着宏大而丰富的世界历史背景。“这部小说重新让我们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那个由无数的鲜活生动的人所构成的年代。所有人经过艰苦奋战,最后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刘 玄)

